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

第2卷第2号 2018年2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论中国政府关于“钓鱼岛”主张的发展过程：
政府宣传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印

目次

■ 摘要	I
■ 论文	
前言	1
外交档案和有关资料的回顾	2
中国国内“搁置争议”共识的形成	7
政府宣传和民族主义的高涨	15
■ 附记	i
■ 作者简历	ii

摘要

自 2012 年 9 月日本政府把尖阁诸岛 / 钓鱼岛“国有化”之后，中日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发展。当时中国政府以日方单方面“背离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达成的”有关“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的“谅解和共识”为借口，开始以硬实力试图打破日方对钓鱼岛长期的实际控制。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 1971 年前根本没有正式提出过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那么，到今天，中国政府有关钓鱼岛主权的论述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中国政府历来的做法和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这篇文章首先利用一些数据和外交档案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围绕钓鱼岛的相关言行。第二，依据《人民日报》网络数据库，研究中国官方关于钓鱼岛论述的发展过程。第三，基于以上，简单地分析政府宣传和民族主义高涨之间的关系。文章的结论是中方主张的有关钓鱼岛“共识”是 2000 年代中期在反日民族主义的高涨的中国国内制造的，没有历史根据，但一旦创造出来就成为阻碍中日和解的棘手障碍。

Abstract

Since September 2012 whe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nationalized" the Senkaku/Diaoyu Islands, the tens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has been continuing. Upon the event, the Chinese authority insisted that Japan had taken unilateral measures which "ran counter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nsensus reached between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on "leaving the issue of Diaoyu Dao to be resolved later." Using this discourse, it justified its masculine attempts to break down the Japanese effective control over the islands that had been maintained over a century. On the other sid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never claimed the islands before 1971 officially. How has Chinese discourse on its sovereignty over the islands developed over the year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ctions and the domestic nationalism observed in China? This paper first studies related materials and diplomatic records to review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references to or behaviors on Diaoyu Islands. Secondly, it uses People's Daily's database to analyze how Chinese authority has developed its discourse over the islands. Thirdly, based on the above, it overvie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the nationalism.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consensus" over the islands was ungrounded, but created by China in mid 2000s when the anti-Japan nationalism was surging in its society. Yet, once it has been created, it became an obstacle to interrupt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论中国政府关于钓鱼岛主张的发展过程： 政府宣传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益尾知佐子（苏琪）

（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一、前言

自 2012 年 9 月日本政府把尖阁诸岛 / 钓鱼岛 “国有化” 之后，中日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发展。最初，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的措施是为阻扰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钓鱼岛开发计划，基于当时的情况，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决定。中方负责人先是在内部表示能够理解，但是后来中国政府就开始严厉批评日方的方案，并向国外大肆报导，宣称这是日方没有解决的历史问题的一部分，引导中国民众在中国各地参加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期间，在中国国内的日本企业因遭受破坏而导致的经济损失至少价值几十亿到一百亿日元。

当时中国政府以日方单方面 “背离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达成的” 有关 “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 的 “谅解和共识” 为借口，开始以硬实力试图打破日方对钓鱼岛长期的实际控制。当月，中国国家海洋局就开始频繁派巡逻船到钓鱼岛附近侵害日方领海，12 月以后，又开始派飞机侵害周围领空。2013 年 1 月，中国军船在东海连续两次将枪炮瞄准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直升机和护卫舰。11 月，中国政府在东海设定了包括钓鱼岛领域在内的防空识别区，把双边的海上斗争正式扩大到空中。2016 年 6 月和 2018 年 1 月，中国军舰进入了钓鱼岛附近的毗连区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一切从 “日方单方面打破共识” 的历史观开始。但是，日本政府认为中方的这些做法歪曲了有关钓鱼岛的事实，还以武力挑战现状，因此，日本政府完全没有任何让步的姿态。从目前来看，中日之间这种极为紧张的关系，很可能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

但另一方面，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在 1971 年前根本没有正式提出过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那么，到今天，中国政府有关钓鱼岛主权的论述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对国内又是怎样解释和宣传自己立场的呢？另外，中国政府历来的做法和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笔者在这篇文章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首先，文章利用一些数据和外交档案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围绕钓鱼岛的相关言行。第二，依据《人民日报》网络数据库，研究中国官方关于钓鱼岛论述的发展

过程。第三，基于以上，简单地分析政府宣传和民族主义高涨之间的关系。文章的结论是中方主张的有关钓鱼岛“共识”是 2000 年代中期在反日民族主义的高涨的中国国内制造的，没有历史根据，但一旦创造出来就成为阻碍中日和解的棘手障碍。

二、 外交档案和有关资料的回顾

（一） 1970 年代以前中国政府关于钓鱼岛的主张

今天中国主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法理的角度来看，钓鱼岛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有无可争辩的主权”¹。但是，如果讲历史，从地理的角度看好像太奇妙，因为中国最近 20 年在附近海域进行了很多调查以后才肯定钓鱼岛处于东海的大陆架上。而且单讲历史也不太能讲得通，虽然在明清时周围海域的（包括琉球）民众都知道海上有这些岛屿，但在东亚前近代国际秩序里，对于国境的概念和现在非常不同，根本不可能按过去的模糊概念来划定近代国家的边境²。

从法理的角度看，中方也是有很多弱点。白皮书谴责“日方密谋窃取钓鱼岛”，并进一步指出：“1895 年 4 月 17 日，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署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笔者注：日文为“下関条約”），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钓鱼岛等作为台湾‘附属岛屿’一并被割让给日本”³。但实际条约第二款（第二）说明“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并未具体说明尖阁诸岛属于台湾的附属岛屿。另外条约第二款（第三）款描述了“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割让给日本⁴。澎湖岛是澎湖列岛最大的岛屿，距离台湾仅 50 公里。而尖阁诸岛中，钓鱼岛距离台湾有 170 公里，大正岛距离钓鱼岛有 110 公里。如果尖阁诸

¹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http://www.scio.gov.cn/tt/Document/1222670/1222670.htm>>（2018 年 5 月 15 日最后確認）。

² 中国经常引用陈侃的《使琉球录》来论证过去琉球和明朝的边境在赤尾屿和久米岛之间。但是陈侃写的是琉球的统治区域只到了久米岛，没有说明明朝的统治区域。众所周知当时台湾也没有接受明朝统治。陈侃写到，福州人关于到琉球的海路并不熟，使者一行在福州见到琉球人问海路，迎接琉球国王的使者为能做他们的导游而感到很高兴。（陳侃，原田禹雄訳註，《使琉球録》（榕樹社，1995 年），页 25）。

³ 同注 1。

⁴ 《马关条约》中文原文参照台湾民政府

<<http://usmgteg.ning.com/forum/topics/6473745:Topic:10403>>（2018 年 5 月 15 日最后確認）。

岛被划入割让给日本的区域，其名称和边界则必须以文字的形式出现。日本主张在台湾及其他附属岛屿被割让给日本之前的 1895 年 1 月，尖阁诸岛通过不同的程序并入了日本。

今天中国说，因为日本二战时战败了，才接受了波茨坦公告，也间接接受了开罗宣言，基于这些文件就必须把钓鱼岛还给中国。但是这些文件只涉及到台湾和附属岛屿，并没有明确包括钓鱼岛。问题在于，当时的新中国是不是认为钓鱼岛为台湾的附属岛屿呢？1949 年，新中国以近代主权国家的形式诞生，照理其领土主权意识应该很浓厚，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有这样的认识。如果中国确实有这样认识，按逻辑来说，不管钓鱼岛在其他什么人手里，中国必须要表达抗议并要求与其磋商。但在美国统治钓鱼岛时，在附近海域发现石油以前，中国（包括台湾）都没有做过任何相关表态。

在 1950、60 年代的公开数据里，唯一能够表明中国对于钓鱼岛官方立场的是 1953 年 1 月 8 日《人民日报》的一则新闻。新闻题目为“资料：琉球群岛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开头这样写道：“琉球群岛散布在我国台湾东北和日本九州岛西南之间的海面上，包括尖阁诸岛、先岛诸岛、大东诸岛、冲绳诸岛、大岛诸岛、土噶喇诸岛、大隅诸岛等七组岛屿。”这表明，当时中方认为，钓鱼岛不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而是日本所属冲绳的一部分。

在中国，媒体一直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也不是一般的民间报纸，而且在 1950 年代媒体没有今天这么商业化。对此，中国人却辩解说，《人民日报》是民间办的，根本不代表官方立场。不过，还有中国外交部的一份档案可以表明当时中国的类似看法，就是在 1950 年 5 月 15 日发布的《对日和约中关于领土部分问题与主张提纲草案》。《草案》在研究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之后，比较详细地讨论了新日本的领土边界问题，也谈到琉球是否“归还”

中国的问题。其中，“东经 123 度—124 度，北纬 25 度 30 分—26 度间之尖阁諸島及东经 124 度—125 度北纬 25 度 30 分—26 度间之赤尾嶼亦离台湾甚近，是否应划入台湾亦须研究”⁵。这些都表明，当时中国政府认为“钓鱼岛”就是“尖阁诸岛”，且其属于琉球，而且也考虑过它的归属问题。所以中国政府直到 1971 年对钓鱼岛没做任何表态，只能说明中国当时就承认钓鱼岛是琉球（冲绳）的一部分，没必要再提其他意见。1953 年《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当然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错误”。2012 年底，在日本媒体报道这份史料后⁶，中国外交部即不再将其档案馆向外国人公开，实际上这就等于承认了这份史料的真实性⁷。

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日和约中关于领土部分问题与主张提纲草案》，1950 年 5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05-00090-05），页 6。

⁶ 時事ドットコム，2012 年 12 月 27 日，<

<http://www.jiji.com/jc/zc?k=201212/2012122700471&g=pol>> (2013 年 5 月 31 日最后確認)。

⁷ 《人民日报》2013 年 5 月 8 日有关琉球归属的报道，也能够说成中方对此报道的辩解。不

1958年，中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其中第1条提到中国的“一切领土”为“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⁸，而没有明确包括钓鱼岛。同年，在中国发刊的《世界地图集》（北京市地图出版社）里，“尖阁群岛”被划为琉球列岛的一部分，处于琉球和台湾之间的边境线东侧。

1969年，联合国ECAFE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在钓鱼岛海域很可能蕴藏着大量的石油，这时中方的主张就开始发生变化。1971年6月，台湾正式开始主张拥有这些岛屿的主权。同年12月中国外交部第一次正式声明强调称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1972年5月，美国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冲绳各岛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

7月新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与北京建交时，他不会认为自己在尖阁问题上与中国保持平等的地位。自1895年以来日本对尖阁诸岛拥有实际的管辖权，而中国在八个月前突然做了意图鲜明的声明，因此，想赢得正式的尊重是不太可能的。客观地说，田中的立场只是希望这个问题不会妨碍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而且当时中国已经被自民党的保守派批评了很久。另一方面，北京希望赢得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在国际上反对苏联并重建国内由文化大革命破坏的经济秩序。中国在这些问题上需要日本帮助，而且才刚对钓鱼岛提出自己的主张，没有办法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所以北京方面没有主动将主权问题摆在桌面上。

（二）交涉：“搁置争议的形成”？

很多中国人认为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共识是中日两国通过谈判在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时形成的。日本外务省公开了大部分相关档案，而中方并没有。因此，我们只能利用日本的外交文件和有限的中国数据来分析双方是否就搁置争议达成了共识。

1972年7月在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开始阶段，周恩来邀请日本公明党总裁竹入义胜访问中国并托他给好朋友田中角荣带话时曾这样具体地解释了他的计划。“我们不需要涉及尖阁问题。我想竹入先生对此不感兴趣。我也是，但是历史学者在人们发现了石油之后开始质疑它，日本的井上清教授对此就比较感兴趣，不过这个问题没有必要重视。”⁹显然，周暗示了中国的主张试图避免在此话题上与日本

过，冲绳是冲绳人通过自己的“本土复归”运动回归日本的，中方的言论在国际上没有说服力。

⁸ 《人民日报》，1958年9月5日，第1版。

⁹ 日本外務省「第2回竹入義勝・周恩来会談記録」北京，1972年7月28日。日文的全文登载于田中明彦教授的数据库“世界と日本”。参照《日中関係資料集》下面的〈日中国交正常化交渉記録〉。井上清是京都大学的历史教授，政治立场明显反日本政府。他给中方提供了

对立。

9 月份田中决定访问北京与中国建交。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档案，9 月 27 日在与周恩来的第三次会面时，田中问了周对钓鱼岛问题的看法。周恩来重复了之前的话，说“因为有了石油，这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不出石油，台湾和美国都不理它”。暗示了美台双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商业计划。然而他再次拒绝了在此问题上给出更多的评价¹⁰。这个文件并不能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此问题达成了搁置争议的共识。两国建交的共同声明中没有任何暗示领土要求的条款。

与东京的看法不同，中国方面根据著名的对日干部张香山的解释认为是日本外务省伪造了史实。1998 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对此问题的引用次数最多。张指出“在第三次首脑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谈起的，双方只是表个态就不谈了。”据他说，是田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总理说：这个问题我这次不想谈，现在谈没有好处。田中首相说：既然我到了北京，不提一下，回去会遇到一些困难。现在我提了一下，就可以向他们（笔者注：指自民党内部的保守派）交待了。周总理说：对！就因为那里海底发现了石油，台湾拿它大作文章，现在美国也要作这个文章，把这个问题搞得很大。田中说：好！不需要再谈了，以后再说。总理也说：以后再说，这次我们把能解决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先解决。”¹¹ 尽管很多中国人强调这是搁置争议共识的证据，但客观地说，他们在上述解释中同意的是避免在那个时候讨论岛屿问题，而不涉及岛的实际状况。将此作为搁置争议共识的证据实属夸张。更确切地说，如果中国表示不想谈论，日方必须将此理解为是中方默认了日本对岛屿的实际控制。

而且，张回忆录的可信度也有问题。尽管基本上他是唯一一个纪录 70 年代外交事件的中国人。但根据日本资料他的名字并不在参会者之列，因为他属于中联部，负责党际关系和民间交流，与外交部有明确的分工¹²。因此，他在回忆录中所纪录的内容是基于国内其他参加者的描述而非他自己的经历。而且根据党的规定，他也不可能将秘密档案放在家里。所以假定他的回忆录可以代表这些会议的细节——尤其是那些在 20 年或者更长时间内写的回忆录——是不可靠的。

有关钓鱼岛主张的基础。

¹⁰ 参照《日中国交正常化交渉记录》中的〈田中総理・周恩来総理会談記録〉，看〈第三回首脳会談（9 月 27 日）〉（アジア局中国課）。

¹¹ 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的回顾〉，《日本学刊》，1998 年第 1 期，页 47。

¹² 了解“搁置争议”性质的时候这点很重要。中国学者经常引用矢吹晋等“权威日本学者”，但是他们很单纯地以为张都参与了这些外交交涉，实际上他的名字没出现于日本外务省的与会者名单。参照矢吹晋『尖閣問題の核心：日中関係はどうなる』（花伝社，2013 年），页 31-34。关于张香山当时的微妙立场，也参照《日中国交正常化交渉记录》中的佐藤大使寄给外务大臣的电报〈日中平和友好条約交渉（第 13 回会談）〉（1978 年 8 月 7 日）。这时候，韩念龙副外长说到，“因为张香山不是外交部的干部，他不了解条约谈判的细节。”

所有的文件都没有周恩来对钓鱼岛问题主权的论述，但解释了田中的关于其突然的争论是针对美台将此正常化的说法。同样，在其他日本的外交文书中，中国在 70 年代初基本上没有提过这个问题，也没有挑战日方对钓鱼岛实际控制的现状。

接下来我们讨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情况。同样，尖阁问题在 1974 年至 1978 年期间并不是大多数双边谈判的主要焦点。然而，1978 年 4 月中旬，悬挂着五星红旗的 100 多艘“渔船”突然出现在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其中近 40 艘进入了 12 海里内的领海¹³。由于这一异常事件令自民党领导人开始关心其主权，因而变成了谈判的障碍。为了重启因此停滞的谈判，中方官员多次向东京方面解释说，这只是一次偶然事件，将来不会再次发生¹⁴。接受了中方的这种说法，日本外相园田直 8 月中旬访问了北京，最终完成谈判。

学者们同意，8 月 10 日园田和邓小平进行了最重要的讨论，也就尖阁问题进行了交流。然而，日本外务省迄今尚未公布包含相关讨论的档案（也有可能是有意没有记录下来）。许多中国专家基于张香山的回忆录认为本次会面形成了搁置争议的共识。根据并未参与谈话的张所述：“在小平同志谈及钓鱼岛问题后，园田外相说，你谈了这个问题，我作为日本外相，也不能不说一点。如果不说，回去就难以交代。关于日本对尖阁的立场，阁下是知道的，希望不再发生那样的‘偶然事情’（指中国捕鱼船队，一度进入钓鱼岛海域），我讲这么一句。小平同志说，把这样的事情摆开，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找到办法，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总会找到办法解决的。”¹⁵

两位日方与会者的叙述更加详细。当时担任外务大臣的园田直和外务省中国课长的和田岛高志赞成了张的在那次会议上园田提出了四月发生事件的说法。但他们认为，邓小平回答说：“中国政府以后绝不会在此岛屿上引起任何问题”，申明中国不会采取任何挑战日本对尖阁诸岛的有效控制的行为¹⁶。

这些回忆录都不能支持邓小平与日方就岛屿的归属问题达成了任何形式的“共识”。更确切地说，如果与会者的回忆录可信，邓承诺将来不会在这些岛屿上采取任何行动的发言意味着接受了在可预见的未来内日本对这些岛屿的实际控制。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档案纪录，10 月，在邓小平与福田首相会面时低姿态重复了中方不愿谈及这个问题希望留给下一代解决。

¹³ 『朝日新聞』，1978 年 4 月 13 日、14 日。

¹⁴ 作者对当时的中国课长田岛高志的采访，2016 年 1 月 27 日于东京。

¹⁵ 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 年），页 90-91。

¹⁶ 园田直，《世界 日本 愛》（新潮社，1981 年），页 183-184。田島高志，〈尖閣問題 『中国側は話し合いを控えたいとし、日本側は聞きおくに留めた』：鄧小平・園田会談同席者の証言〉，《外交》第 18 号（2013 年 5 月），页 77，<<http://www.jfir.or.jp/j/article/pdf/130331.pdf>>。田岛在个人日记上记录了会谈的细节（作者对田岛的采访，2016 年 1 月 27 日）。

这与中国在 2012 年的宣传大相径庭。那么，邓小平又是如何描述自己与日方的谈判呢？由于他不愿意多谈自己，如今我们能够了解他公开的数据仅限于《邓小平文选》，这是关于他思想最为权威的叙述。据此，在 1984 年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上，邓小平就领土问题做过这样的发言。“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¹⁷ 同样，他并没有提到与日本领导人达成了任何共识，只是说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达的希望。从他这种不连贯的“实用主义说法”，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与日方达成满意的解决方案很困难。

如上所述，包括张的回忆录在内，没有任何可用的史实能够证明两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搁置争议达成了共识。或许在两国就此争论到达顶峰的 2012 年，中方没有公布任何外交文件的事实更能说明。根据 1996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国可以公布三十年前甚至更早的文件，但当时并没有这样做——暗示没有能支持论点的文件。

直到 1992 年 2 月中国发表了《领海及毗连区法》，尖阁诸岛才从中国的官方声明中消失。讽刺的是，若两国之间存在任何“共识”的话，这部法律的出台恰好是打破共识的行为。其中第二条规定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在国内法上是首次。据说外交部起草的草案上本来没有包括钓鱼岛的词汇，后来因为中国军方的主张而加上的¹⁸。1996 年以后，中方依此法采取了多次行动以主张钓鱼岛的归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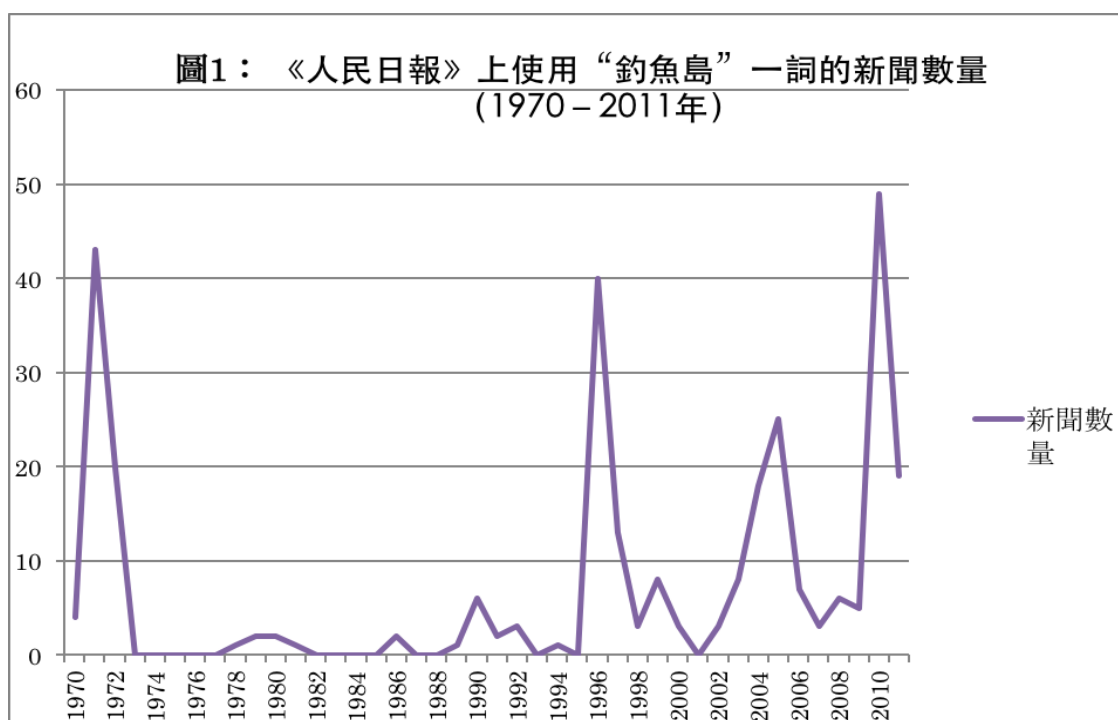
三、 中国国内“搁置争议”共识的形成

（一）《人民日报》相关内容的数量分析

下面就概览一下历年来中国官方关于钓鱼岛的说法。下图表示“钓鱼岛”一词出现在《人民日报》中的文章数的变化。笔者借用了 Oriprome 社提供的《人民日报》网络数据库，因为这个词在 1969 年以前的《人民日报》上没有出现过，而在 2012 年由于“国有化”事件而导致相关报导达到了 274 篇，图示为这两个时间区隔。

¹⁷ 《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页 87。

¹⁸ 杉浦康之，〈天皇訪中 1991-92 年〉，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關係史 1972-2012 I 政治》（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 年），页 271。



从数量来看,《人民日报》的相关报导经历了很大的波动。自 1970 年 12 月 4 日《人民日报》开始报道钓鱼岛,在其后 1 年半的时间里,中方一共发布了 67 篇相关消息。当时中国新闻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充满着像“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走狗”、“罪恶”、“勾结”等不雅词汇。其中,1970 年 12 月的最初 4 篇文章,内容都是中国跟朝鲜一起反对美国、日本、台湾、南朝鲜(韩国)共同开发海底资源。刊登在 12 月 31 日的一篇长文,首次详细介绍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大陆架概念及其与石油开采的关系。1971 年年中之后,《人民日报》才开始表示对美日安保条约和日本防空范围等安全问题的关注,严厉批评美国把钓鱼岛作为冲绳的一部分归还给日本的计划。同年 12 月,中国外交部正式开始申明对钓鱼岛的主权。这样看来,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应该说是由石油利益引起的,但是马上又扩大到对自己的国家安全、执政正统性方面的考虑。

有意思的是,在 1972 年 5 月冲绳回归日本过程结束之后,在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前的 4 个月,中方基本上停止发表有关钓鱼岛的言论。从 1973 年到 1995 年,属于有关报道的低潮期。从 1973 年到 1977 年,《人民日报》上完全没出现“钓鱼岛”的词汇。1978 年的相关报道出现于邓小平访日期间,就是他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谈到钓鱼岛问题的时候。(邓曰,“这个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从 1979 年到 1981 年的相关报道,基本上都是关于周围海域共同开发的问题。从 1982 到 1988 年,除了 1986 年的两篇新闻以外,《人民日报》上又没有关于钓鱼岛的消息,而且这两篇文章也没涉及到任何政治分歧(1 月份的文章是关于在钓鱼岛附近发现的新矿产,6 月份的是有关外海捕捞增产)。虽然这时候中方也

没有放弃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但是这些报导暗示中国对它的主权立场是有一定保留的。

在 1989 年，以上趋势稍有变化。从 1989 到 1992 年，《人民日报》刊载了有关钓鱼岛的 12 篇新闻。1989 年 5 月的一则新闻介绍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论，发言人针对之前日本宇野作相向苏联戈尔巴乔夫表示钓鱼岛不存在搁置争议的表态，重申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不过，当时这位发言人的言论完全没有 2012 年中方对日本的批评那样严厉。1990 年，中方将日方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上设置灯塔和日本政府在附近海域阻挠台湾渔民捕捞这两件事当作大问题，开始有保留地批评日本政府。1992 年，中国制定了《领海及毗连区法》，在法律上把钓鱼岛首次列入自己的领土范围。

从数目上来看，1996 年是中方相关言论变化的一个转折点。1995 年，《人民日报》上没有出现有关钓鱼岛的新闻。但是在 1996 年，相关报道突然达到 40 篇，在 1997 年虽然有所减少但还是有 13 篇。当时针对“日本青年社”（日本民间右翼团体）登陆钓鱼岛试图修建灯塔一事，中方多次表示“愤慨”¹⁹，认为这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炫耀实力的必然表现”²⁰。同时也开始使用“蠢事”“谎话”“吹牛”等情绪化语言来批评日本政府²¹。1996 年 10 月 1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钟严”的一篇题为《论钓鱼岛主权归属》的长文，第一次以历史的观点详细介绍了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理由。《人民日报》第一次登载有关香港等地的“保钓”运动也正是这个时候（1996 年 10 月 1 月）。

1996 年之后，《人民日报》关于钓鱼岛的报道出现过三次高峰：2004—2005 年（共 43 篇），2010 年（49 篇）和 2012 年（图案外，274 篇）。导致 2004—2005 年报道高峰的直接原因是中国民间“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而受到日本政府阻止一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此时已经允许大陆“保钓”人士向钓鱼岛方向出港。2010 年，发生了中国渔船冲撞两艘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的事件。2012 年，因为钓鱼岛“国有化”和后来的抗议活动，《人民日报》对此做了大量的抗议性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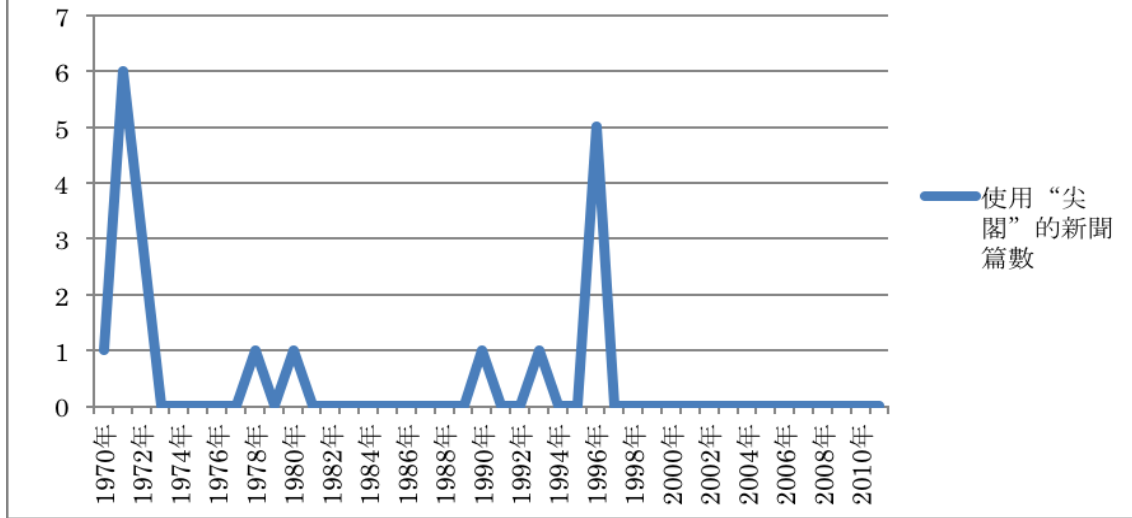
那么，如果在《人民日报》数据库里输入“尖阁”一词，会出现甚么样的结果？下文展示了 1970 年以后的相关查询结果。虽然《人民日报》在 1953 年 1 月份的相关报导中使用了“尖阁”一词，但是因为后来直到 1970 年一直没有相关报道，这个图表删掉了前半段时间。

¹⁹ 参见《人民日报》，1996 年 8 月 30 日第 6 版、9 月 11 日第 1 版、14 日第 2 版等。

²⁰ 《人民日报》，1996 年 8 月 30 日第 1 版。

²¹ 《人民日报》，1996 年 8 月 30 日第 1 版、9 月 14 日第 2 版。

圖2：《人民日報》上使用“尖閣”一詞的新聞篇數
(1970—2011年)



有意思的是，从 1970 到 1996 年，《人民日报》上时而出现“尖阁”一词，而这些报导解释说，日方和中方对同一群岛的所有权有不同见解。可以说，关于钓鱼岛，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还处于“两论并认”的状态。因为当时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还没有多久，自己仍处于初步挑战者的阶段，有必要在报导中说明中国政府所说的钓鱼岛就是日方所说的尖阁诸岛，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到了 1997 年，“尖阁”一词被《人民日报》完全抛弃了。如上所述，1996 年以后有关钓鱼岛的新闻总量大幅增加，但这一情况与之前的趋向刚好相反。大概在 1997 年，中国官方媒体打破了过去 27 年关于钓鱼岛主权的犹豫，开始主张自己的立场是唯一正当的。

其实，《人民日报》第一次谈到“搁置争议”的也是 1996 年。这份报道说：（有关钓鱼岛）“中方还很早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设性设想”²²。当时它也没有把“搁置争议”叫做中日之间的共识，反而慢慢改变说法，后来慢慢形成中国国内的“共识”。

这些查询结果表明，中国有关钓鱼岛的宣传大约在 1996 或 1997 年进入了新的阶段。实际上这时候中国单方面升级了自己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在国内宣传中给自己和日本以平等申明钓鱼岛主权的待遇。同时，中国也开始强调“在两国邦交正常化时，双方就约定要在将来解决”这个问题²³，给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以

²² 《人民日报》，1996 年 9 月 14 日，第 2 版。

²³ 《人民日报》，1996 年 11 月 21 日，第 4 版，当时日本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的发言。笔者怀疑它的内容是不是正确反映了鸠山的意思。如上所述，1978 年邓小平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这个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但是邓小平也没有讲在他访日期间中日两国政府同意首先要搁置或者将来要解决这个问题。中方今天所说的中日之间的“共识”，很可能

“单方面制造麻烦”的形象定位，同时暗示要适时收回钓鱼岛主权的决心。不过，这时候日本政府仍然从保持中日两国大局的观点出发，对钓鱼岛没有采取任何新的措施。

（二）单方面制造的“共识”

接下来我们讨论关于搁置争议的论述，2012 年中国为此对日本大加指责。表 1 是《人民日报》中正文包含“钓鱼岛”和“搁置争议”说法文章的一览表（仅精准匹配的结果）。自 1946 年（创刊）至 2016 年末以来共计 32 篇，其中笔者除去了四篇正文中有关钓鱼岛问题并未提及搁置争议说法的文章²⁴。这张表显示了搁置争议的说法是如何在实际文本中体现的。“正文中提及搁置争议的主体”代表在正文中提及搁置争议的主体，如果是文章的作者，表中则标明他的姓名；如果是引用他人的发言，表中则显示发言人的姓名。“提出搁置争议的主体”代表提出搁置争议的主体。若由中国提出则显示“C”；若由日本提出则显示“J”；若两方都涉及到则显示“B”。“搁置争议的说法”代表提出搁置争议的主体是怎样描述“搁置争议”这种说法的，比如“共识”或者“提议”等等。由于搁置争议之后常接其他内容以强调特定的含义，所以表内用“搁置争议后面的内容”代表搁置争议之后的内容。

一览表显示了在中国语境下关于搁置争议说法的显著变化。首先，尽管两国之间的“共识”据称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达成的，但《人民日报》中第一次提及此是在距离谈判 20 年之后的 1996 年 8 月。其次，文中写到中方向日方“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未提及日方的响应。这种描述与《邓小平文选》中的内容一致。之后几年的文章中也同样表明了是中国单方面“主张”，表达搁置争议的说法变成了“建设性设想”和“方针”等。在这个阶段之后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共同开发”。

第三，转折点出现在 2004 年 7 月 2 日。这篇文章由《人民日报》的编辑根据“人民网”上关于中日两国关系日渐紧张的讨论以问答的形式整理而成。当问及邓小平向日方提出搁置争议的意见时，一位来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孙玲玲博士回答说：“中日建交之时，曾就钓鱼岛问题达成‘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共识。但日本未信守承诺，屡屡挑起事端，致使争议非但未被搁置，反而愈演愈烈，共同开发更无从谈起。”由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当时中国社会日益高涨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她成为《人民日报》上将搁置争议成为日本不得不遵守的“共识”的第一人。以她的资历来说，在同一篇文章中评论知名的高级学者绝对

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存在。

²⁴ 《人民日报》数据库中有一篇长文分四页出现（2012 年 10 月 31 日），笔者将其算成一篇文章。

是非凡的一步。半年之后，她为人民日报单独撰写了一篇文章阐述她对尖阁问题的看法，在没有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重复了“搁置争议共识”的立场。此后，《人民日报》基本上将搁置争议（被形容为“共识”或者“默契”）视为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与中国之间达成一致的协议。2012 年以后，为了在国际上宣称这一说法，如表 1 中浅绿色部分所示，《人民日报》反复“引用”日本名人的话以强调他们（日方）已经同意存在双边共识。因为《人民日报》有其明确的政治意图所以这些引用的准确性值得怀疑。

第四点是搁置争议之后的内容，在一览表的前半部分，特别是提出搁置争议的主体是中国的时候，其后的内容常常是“共同开发”，这与邓小平对日方的提议一致。然而，在声称搁置争议是中日双边协议的文章中，其后的“共同开发”常被忽略，或者被“留待以后解决”所代替。事实上，自 2004 年中国开始在靠近东海中间线一侧开采天然气以后，联合勘探天然气已经成为两国之间的一个大问题。2008 年 6 月，当两国政府就此达成初步协议时遭到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也就是说，当中国舆论反对邓的提议时，《人民日报》就将其后原本的内容跳过，称搁置争议为“共识”而非邓小平自己的“意见”，并加上了新内容以将搁置争议变成对中国有利的意思。就像白皮书中的内容一样，“以后解决”常被代替成“共同开发”以强调日本已经同意今后就领土问题与中国谈判。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如深橘色部分所示，保存外交档案的中国外交部的官员在《人民日报》上从未明确提及有关两国领导人于 20 世纪 70 年代所达成的有关搁置争议的内容和有关岛屿问题的双边“共识”。

基于上述结果可以确定，搁置争议仅是在本世纪初于中国社会发展而成的单方面共识。它不是东京和北京之间在外交场合达成的双边共识，而是在强烈的抗日氛围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形成和演变的。当《人民日报》想要脱离和东京达成一致的两国联合开采天然气项目时就轻易地将“共同开发”省略。

表1:人民日报中有关“钓鱼岛”问题“搁置争议”的说法(1946.10.1-2015.12.31)						
检索词：钓鱼岛*搁置争议(正文)		* 表内不包括四篇正文中有关钓鱼岛问题并未提及“搁置争议”说法的文章				
#	文章标题	日期	正文中提及搁置争议的主体	提出搁置争议的主	搁置争议的说	“搁置争议”后面的内容
1	日本别干蠢事	1996.08.30 第1版	本报评论员	C	主张	共同开发
2	不允许把中日关系引入歧途	1996.09.14 第2版	记者	C	建设性设想	共同开发
3	为了世代友好——访日本先驱新 党干事长园田博之（附图片1 张）	1997.06.16 第6版	园田博之（园田直的儿子）	C（邓小平）	主张	留待将来解决
4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99.09.03 第1版	本报记者 陈特安 郑园园	C（邓小平）	方针	共同开发
5	提问中日关系	2004.07.02 第7版	提问+孙玲玲（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 所法学博士）回答	C(邓小平)+B(建 交时)	提出+共识	共同开发
6	有悖国际法的单方行为	2005.02.23 第3版	孙玲玲	B	共识	-
7	做大国梦 施小伎俩（国际论 坛）	2005.05.26 第3版	于山	B(建交时)	共识	-
8	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2006.03.10 第4版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C	原则	共同开发
9	从历史事实看钓鱼岛主权归属 （权威论坛）	2011.01.13 第23版	刘江永;苗再新	C	合理的选择	共同开发

10	战略短视是自欺欺人的懦夫心态 (国际论坛)	2012.07.13 第3版	《北海道新闻》	B	-	-
11	中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声明	2012.09.16 第3版	中国各民主党派	B	重要谅解和共	留待以后解决
12	国际知名专家学者谴责日本侵犯 中国领土主权	2012.09.19 第3版	《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大石格	J	做法	-
13	日本民主党最高顾问说应搁置钓 鱼岛争议 公明党表示愿协助政府 修复日中关系	2012.09.24 第3版	前财务大臣藤井裕久	C(周恩来&邓小平)	主张	-
14	中国维护钓鱼岛主权又一有力举 措	2012.09.26 第3版	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新	C	方针	-
15	中国捍卫钓鱼岛主权有理有据 — —专家解读《钓鱼岛是中国的固 有领土》白皮书	2012.09.27 第2版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	B(建交时)	政治默契	-
16	拙劣的双簧	2012.10.16 第3版	金采薇	B	务实的选项	-
17	亚洲国家谴责日本政客参拜靖国 神社	2012.10.19 第3版	李琰;刘军国;马菲;暨佩娟	B	共识	-
18	日本三党就对华政策互相攻讦	2012.12.02 第3版	石原慎太郎	B	共识	-
19	日本 76%新当选众议员赞成修 改和平宪法 友好人士望新首相尽 快改善日中关系	2012.12.18 第3版	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	B	共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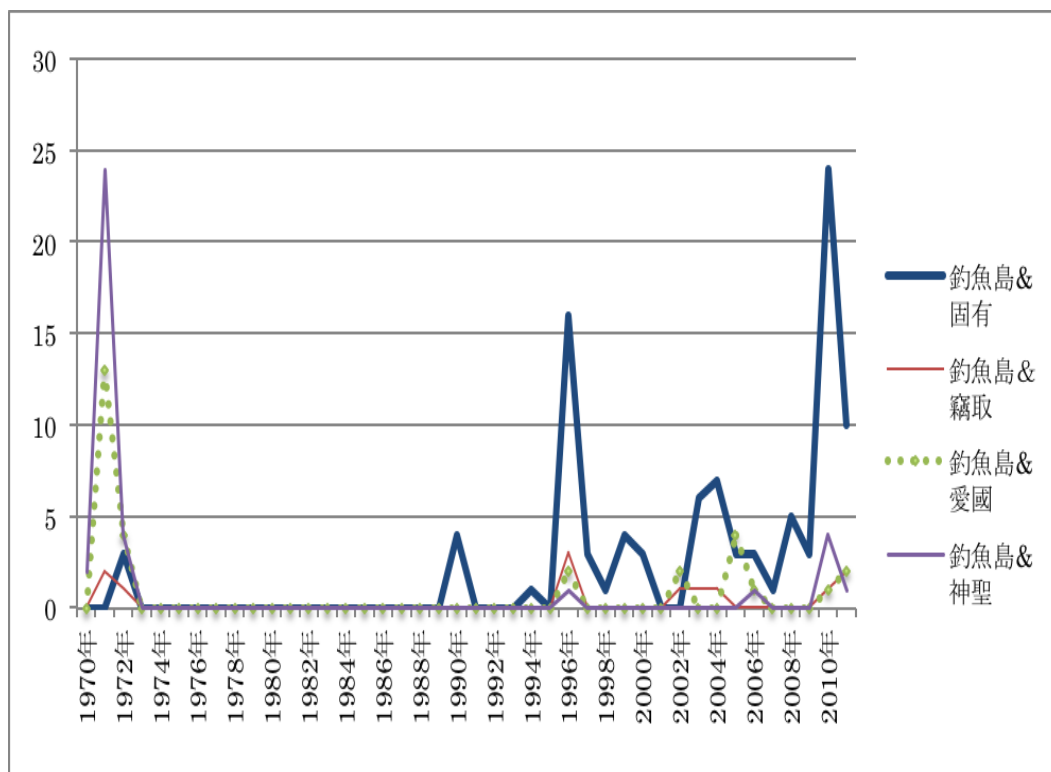
20	日本外交旧瓶装旧酒	2012.12.30 第3版	毛里和子	B	一致	-
21	互信才能友好	2013.01.26 第3版	西园寺一晃(西园寺公一的儿子)	B	默契	-
22	日中曾就搁置钓鱼岛问题达成共识	2013.06.05 第1版	前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	B	共识	-
23	从国际条约视角论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	2013.08.15 第3版	汤重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B	共识	-
24	中方敦促日本领导人停止挑衅	2014.01.25 第3版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J	现状	-
25	对话的“大门”在哪儿(国际论坛)	2014.02.26 第3版	金采薇	B	默契	共同开发
26	日方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2014.04.16 第3版	同志社大学教授浅野健一	B	默契与共识	-
27	中日曾在钓鱼岛问题上达成谅解和共识	2015.01.01 第3版	英国国家档案馆(铃木善幸)	B	谅解和共识	或维持现状
28	维护合作, 离不开理解与宽容(名家笔谈)	2015.10.26 第5版	傅莹	C	-	-
	C…仅中国, J…仅日本, B…中日两国					
	中国外交部的评论		用引用方式主张日方同意共识存在的报道			

（三）《人民日报》的相关措词分析

那么，中国官方媒体报导钓鱼岛问题的方式，历年来有什么变化呢？

2012 年日本政府把尖阁三岛国有化事件前后，中国媒体用各种语言对钓鱼岛宣示主权并咒骂日本。其中，笔者选择了语气坚决、语调强硬的四个词语：“固有”、“窃取”、“爱国”、“神圣”，调查它们在《人民日报》有关钓鱼岛报导上的出现频率。因为 2012 年的结果太特殊（“固有”在 100 篇文章里出现、“窃取”在 33 篇、“爱国”在 19 篇、“神圣”在 24 篇），下图所示是把这一年份不计在内的结果。

图 3：“固有”、“窃取”、“爱国”、“神圣”四个词在《人民日报》上的出现频率
（新闻篇数）



总的来说，上面的查询结果还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70—1972 年、1972—1995 年、1996—2011 年。如果考虑到 2012 年的特殊性，可以说到现在一共出现过四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就是中国刚开始主张对钓鱼岛主权的时期，这四个词都出现过，但是它们各自的重点和后来有所不同。《人民日报》当时使用“神圣”和“爱国”较多，反而较少使用后来经常出现的“固有”和“窃取”。由此可见，这个时期中方的主张煽动性较强，但是关于所有权根据的意识还是比较薄弱。在第二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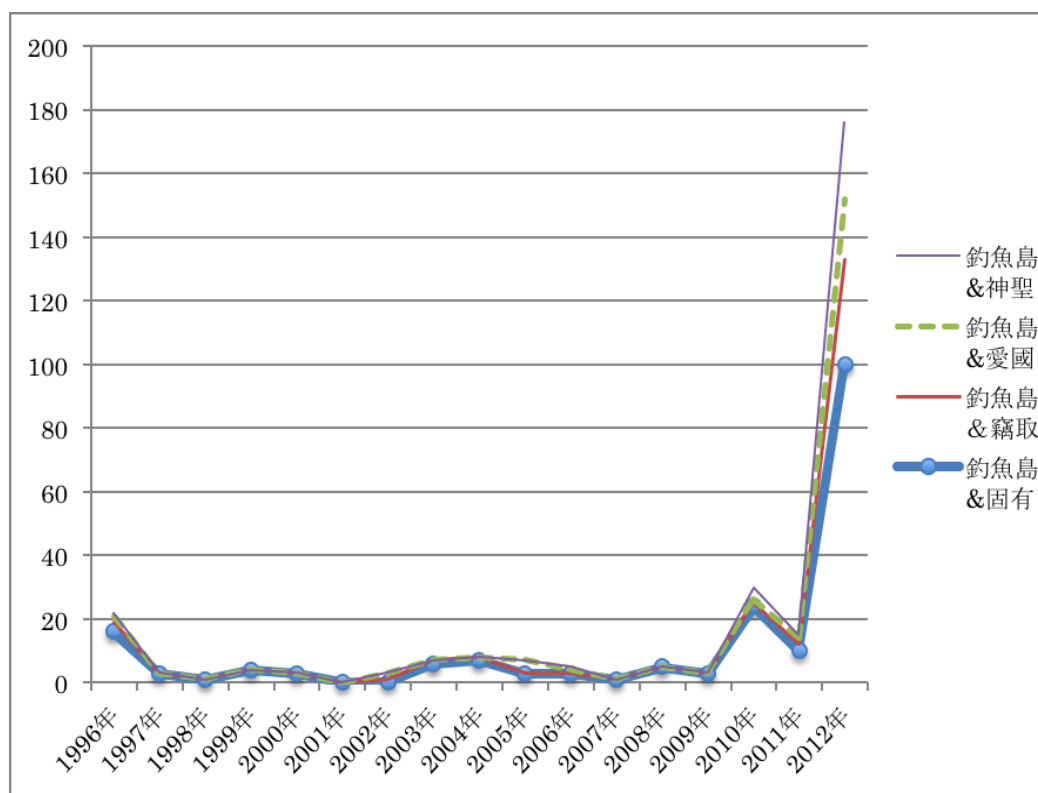
除了1990年用过四个“固有”以外，这四个词几乎都没再出现。

在第三阶段，“固有”明显变成中方最常用的词。因为“固有”也是日方关于尖阁诸岛主权主张的惯用语，这大概表示中方开始意图更明确地认为自己的主权根据比日方要强。其他三个词汇的用法也有很多变化。这些词汇在1996年均恢复使用，但是“窃取”和“爱国”在1996年和2000年代中期被反复使用，反而《人民日报》对“神圣”的使用继续保持了比较克制的态度。2010年，《人民日报》打破了多年的限制，像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一样，开始多次使用“神圣”一词，把这些岛屿当作国家统一的象征。

不过，从总体来看，对“窃取”、“爱国”、“神圣”这三个词的使用，直到2011年还是有限的。反过来说，2012年是明显表现异常的一年。如上所述，这四个词的使用量突然多了起来。除了长年常用的“固有”之外，“窃取”的使用量最多达到33篇，“神圣”的使用量也达到24篇。用“窃取”的时候，目的是责怪对方的非法性和非道德性，不尊重对方所持的立场。应该说，到这时，中方的宣传实际上已达到不允许政府做任何让步的程度。

中日建交以后，特别是1996年以来，中方在宣传报导中慢慢提升了有关钓鱼岛主张措词的严厉程度。到了2012年，就对中日两国的主张明确判定出了是非黑白，把自己的主张神圣化，断定日方有罪，用情绪化的语言煽动人心。

图4：在《人民日报》有关报导上使用“固有”“窃取”“爱国”“神圣”等词的新闻总数



上图表示，从 1996 到 2012 年，《人民日报》使用上述四个词汇的文章总数。从措词的角度来看，虽然中方的反日宣传在 1996 年、2000 年代前半段和 2010 年都有过高潮，可是在 2012 年出现的高峰实属罕见。可以说，在 2012 年，不单是民众的反日运动，就是官媒的反日宣传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四、 政府宣传和民族主义的高涨

上面的简单分析表明，中国官方关于钓鱼岛的行动，大约在 1996 年前后有了很大的改变。这大概与中国政府和媒体、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时间段有所重迭。以前，中国领导人可以相当自由地作出外交决策，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将其当作中国政府的程序化见解，让国内民众接受。关于钓鱼岛，虽然中国也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但是邓小平对国内提出自己的中日友好方案，很可能是以所谓的“共识”来安抚国内反对分子，不允许他们因此闹事。这样，有关钓鱼岛的“神话”（国内程序化见解）形成了，但是这样的宣传仅限中国国内有效。

1996 年，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有关钓鱼岛的言论，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允许在国内介绍日方的观点（除了共产主义学者井上清的著作以外）。相反，中国媒体根据原来中国共产党交给它们的“神话”，反复再生产对自己有利的非均衡化报导。正如本文所述，“搁置争议”是 2000 年代中期由中国媒体单方制造的“共识”，并没有基于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谈判。而且中国国内舆论不赞同“共同开发”的时候，国内说法有改变，原来的“共同开发”就被代替成“以后解决”。中国的宣传重复了几次高潮与低潮之后于 2012 年，最终导致民众愤怒的大爆发，而他们泄愤的目标正是不尊重中国“神话”的日本。不过，这一“神话”很可能本来就没有多少可信性。

虽然中国的案例比较极端，但媒体和民族主义发生此类联系却是一般性现象。通过细化多种鉴证来分析韩国人有关独岛民族主义的玄大松先生，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媒体重复产生各种神话和意识形态，并用这样的方式来构成‘社会性现实’。但韩国的知识分子和媒体构成的‘公共圈’和在此内讨论的‘独岛论’，总回避涉及此问题的灰色地带，这是一个很偏倚的言论空间。他们把对独岛的主权主张，和过去问题、历史认识问题连在一起，不断地让人想起历史上的记忆。”²⁵

因为领土主张很容易被当作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象征，本来局限于小范围的领土问题，通过民族主义和偏颇报道的放大，会经常导致其与历史问题相联系，

²⁵ 玄大松，《領土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誕生—「独島／竹島問題」の政治学》（ミネルヴァ書房，2006 年），页 275。

从而变成导致两个民族间互憎的一大因素。据报道，在中日关系非常紧张的 2012 年，中国在国内投资拍摄的抗日题材电视剧达到两百部²⁶。显然，如果每一个国家都去发展这种不甚健康的民族主义，在每一次在边境发生偶然事件的时候，各国内政都趋向保守化，国内舆论也更猛烈地去批评自己的政府，那么，邻国之间的关系只会更加紧张。

最后来思考一下，中国对钓鱼岛问题的主张为什么在 1996 年开始发生了变化？当然，确切地证明很多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难的，依据现在的资料也只能推测出其中可能的原因。从两国关系的角度来说，1996 年前后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关系开始恶化的转折点，第一个主要原因是冷战以后东亚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台海危机以后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很有市场，中国也很警惕日美安保体制的再定义，并且对自己在进行核试验以后日方停止对其无偿援助感到不满。第二，中国很关注日本右翼团体编纂历史教科书一事，1996 年夏天桥本龙太郎首相还参拜了靖国神社，历史认识问题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变成两国之间很大的摩擦点。两国关系的紧张导致日本右翼和华人保钓运动更为活跃，这激化了两国关于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分歧。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必须要意识到的因素是：中日两国在同一年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有了海洋法之后，小规模的土地问题都可以联系到所谓海洋权益的问题。在过去的 20 年里，东亚国际关系尤其在海洋领域呈现出紧张的态势。这种紧张态势，不仅仅是由一些国家 / 民族之间的领土争端所造成的，还有因海洋法诞生导致外在条件变化引起的。东亚各国必须而且只能共同努力来克服这一新的调整与挑战。换言之，东亚的未来决定于各国如何管理好本国的民族主义。

²⁶ 《産経新聞》，2013 年 4 月 30 日，<
http://sankei.jp.msn.com/west/west_affairs/news/130430/waf13043008000001-n1.htm
> (2013 年 5 月 31 日最后確認)。

附记

本文是本人于 2013 年 5 月 31 日在国立台湾大学举办的《第三届日台未来论坛：近代日本政治思想的展开与东亚的民族主义》（公益財団法人渥美国際交流財団関口グローバル研究会主办）发表的会议论文，以及 2016 年 10 月 27、28 日于位于东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举办的专题研讨会“Exploring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Stephan R. Nagy 副教授主办）发表的会议论文的改定版，在此对提供本人发表机会的主办单位表示感谢。另外本文也是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費若手研究 B「中国における对外政策の全体的な調整・決定・執行メカニズム」（研究代表：益尾知佐子，課題番号：23730168）、同基盤研究 C「『シルクロード経済帯』建設の政治効果：中国による新型国際関係樹立の試み」（研究代表：益尾知佐子，課題番号：16K0352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益尾知佐子 **Chisako T. MASUO**

学 历 日本东京大学博士

现 职 日本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研究领域 东亚国际政治、中国的对外政策

官方网页 <http://hyoka.ofc.kyushu-u.ac.jp/search/details/K003389/research.html>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 2017 年 8 月 1 日创刊

出版日：2018 年 2 月 1 日

出版者：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辑部：

主编：松田康博

副主编：清水 丽

副主编兼执行编辑：黄 伟修

助理编辑：魏 逸莹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February 1, 2018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Urara SHIMIZU,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Assistant Editor: Iying WEI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February 1, 2018 Vol. 2 No.2

<http://jeast.ioc.u-tokyo.ac.jp/>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Official Discourse on Senkaku/ Diaoyu Islands: Government's Propaganda and Surging Nationalism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